

【区域协调发展】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互嵌式发展研究*

郑长德

摘要:推动经济互嵌发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推进各民族和民族地区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从经济上看,互嵌式发展是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交易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且经济互嵌发展对于各类资本积累、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民族八省区在经济发展、贫困减缓、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就业结构、空间分布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经济互嵌程度,而且各地区经济互嵌程度已有了显著提升,但互嵌程度和水平也受到一些因素的约束。因此,进一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互嵌式发展,还要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进一步提升经济互嵌水平,持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各种成本,持续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深度对接和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在协调发展中推进经济互嵌式发展,利用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升产业的嵌入性和融合发展水平,互嵌导向型的对口支援与合作政策,着力提高民族地区互嵌式发展的内生潜力。

关键词:民族地区;经济互嵌式发展;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1—0088—11 **收稿日期:**2023-11-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历史交汇期’有效缩小民族地区多维发展差距的理论与对策研究”(18AMZ001);2022年度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中国西部民族经济研究中心”“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报告2021—2022年)”(CWEER20220001)。

作者简介:郑长德,男,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 610225)。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把各民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习近平,2019)。确保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共同实现现代化,既要坚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不断消除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不断满足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要使发展成果体现在实现中

华民族一家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因此,如何在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同全国共同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出台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习近平,2019)。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把

促进各民族在经济上相互嵌入、融合发展作为着眼点和着力点,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现各民族共同实现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不断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郑长德(2022)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了经济互嵌式发展的框架,分析评估了各民族经济互嵌式发展的进展。本文从地区的角度,分析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地区)经济互嵌式发展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多民族地区经济互嵌式发展:相关研究与分析框架

从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上几乎每一个经济体都是文化多样的,这体现在多个方面,如民族、种族、宗教、语言(包括方言)、地域等,特别是随着国际、国内移民,这种多样性有增无减。长期以来,关于文化多样性的研究主要是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的论题。近年来,文化多样性受到经济学者的关注,侧重于文化互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文化互动对经济福祉水平和增长的影响,以及经济条件对文化互动的影响。涉及的主题包括:微观上,文化多样性与经济主体的行为,文化多样性形成的微观基础;宏观上,文化多样性与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可持续发展等([美]菲利普·阿吉翁,[美]史蒂夫·杜尔劳夫,2019; Alesina A and E La Ferrara, 2005)。

互嵌或“嵌入性”(embeddedness),是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种结构关系,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由卡尔·波兰尼(Polany, 1944)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提出,表示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85)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发展成了“嵌入理论”,成为所谓新经济社会学的两个主要理论概念之一。

从经济上看,互嵌式发展是一个地区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交易形成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基于市场交易的经济互嵌,如各民族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可以满足各民族的多样性偏好、要素的匹配;

基于非市场的经济互嵌,如公共产品供给、援助与转移,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享有,助推内生能力提升,同时分享公平发展的红利。经济互嵌从微观上主要表现为法人单位(主要是企业)就业的文化多样性,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企业就业,共同创造价值,在家庭层面通过族际间通婚显示出家庭文化的多样性。在宏观上,经济互嵌在供给侧表现出要素供给的文化多样性,在需求侧表现出需求的文化多样性,如偏好的多样性等;在人口构成上表现出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各民族交错杂居,特别是各民族的城镇化水平是经济嵌入发展的重要方面。

一个地区各民族经济嵌入的范围、深度受很多因素影响,如民族政策、经济发展水平、各民族教育水平等。借用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weak ties)与强关系(strong ties)的划分,根据经济嵌入的深度,可以把经济嵌入划分为弱嵌入(weak embeddedness)和强嵌入(strong embeddedness)。各民族中,城镇化程度高、散居的,嵌入程度高,可被视为是强嵌入;聚居的以农牧业为主、城镇化水平低的,可被视为弱嵌入。

通过经济互嵌式发展,不仅扩大了各民族(地区)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选择空间和技能、偏好的匹配空间,通过互嵌式发展过程中的“干中学”,各民族相互溢出,提高了各民族的选择能力,而且还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形成的交往自由、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具体来说,经济嵌入发展,其一是共享,企业中的民族多样性,可以实现文化的互补和共享共同的文化价值、共担风险,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基础;其二是匹配,经济互嵌式发展,提高了技能匹配、偏好匹配的机会和质量,提高报酬递增的程度;其三是学习,学习的基本特征是,在很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学习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涉及和其他人的相互关系。经济互嵌式发展,把有各自文化特点的不同民族人口集中到一起,有利于学习的进行,即知识与信息的生产、积累和扩散。通过这些机制,经济互嵌式发展,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从而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总之,经济互嵌式发展提高了各民族当家作主的能力和水平,实现了公平发展,提升了共享公共产品的范围和水平,从而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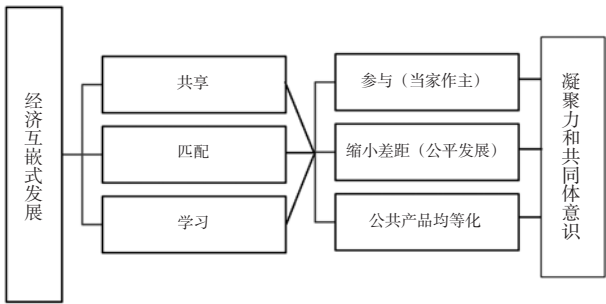


图1 经济互嵌式发展:简单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根据上面的分析,这里利用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把反映互嵌程度的指标(一个地区的民族构成多样性和少数民族城镇化水平)与反映企业家精神(用每万人工业企业数代表)、创新(用每万人授权专利数代表)和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代表)的指标进行简单拟合,如图2、图3、图4所示,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比较显著。当然,有相关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但至

少可以表明,经济嵌入程度与经济发展、创新之间存在彼此促进的关系。

三、民族地区经济嵌入发展:现状特点

根据上一节的分析框架,经济嵌入发展表现在经济发展、受教育程度、就业结构、城镇化与民族构成等方面,本节以民族八省区为空间范围,主要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这些地区经济嵌入发展的现状特点。

1.经济发展与经济嵌入

基于市场的经济发展,意味着分工的深化和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这能更充分地挖掘和发挥经济主体的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族地区与全国一样,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郑长德,2021),为各民族的经济嵌入提供了丰富的经济机会。

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结构变迁过程,这种结构变迁在产业发展上表现为生产要素从边际产出低的部门向边际产出高的部门的流动,具体就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包括非农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提高和非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上升(见表1),这大体上反映了各民族经济嵌入的水平。

2.消除绝对贫困、城乡差距缩小与经济嵌入

2012—2020年,中国政府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到2020年年底,现行标准下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地区向来是贫困人口集聚地区,呈现出“量大、面宽、程度深”的贫困特征,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全国脱贫任务最重的区域,2012年年底,民族八省区有贫困人口3121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31.58%,贫困发生率21.1%,是全国10.2%的2倍多。2012—2020年的脱贫攻坚,民族八省区每年减少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平均在400万人以上,到2020年,消除了困扰各民族数千年的农村绝对贫困,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人间奇迹》编写组,2021)。在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过程中,政府强力推进,各民族人民广泛主动参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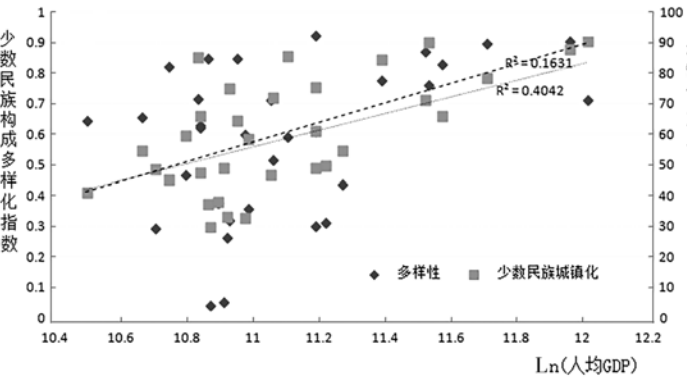


图2 民族构成、少数民族城镇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和《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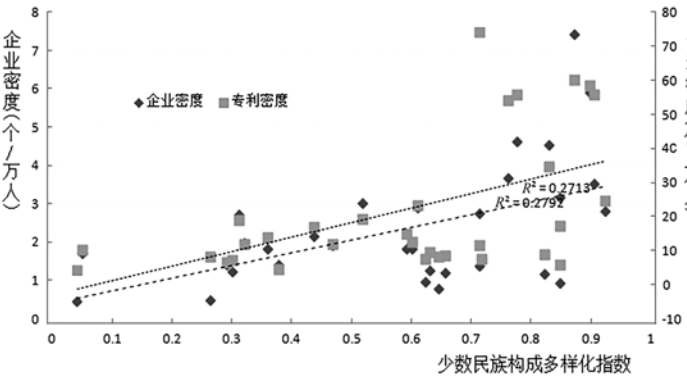


图3 民族构成、企业密度与专利密度

数据来源: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和《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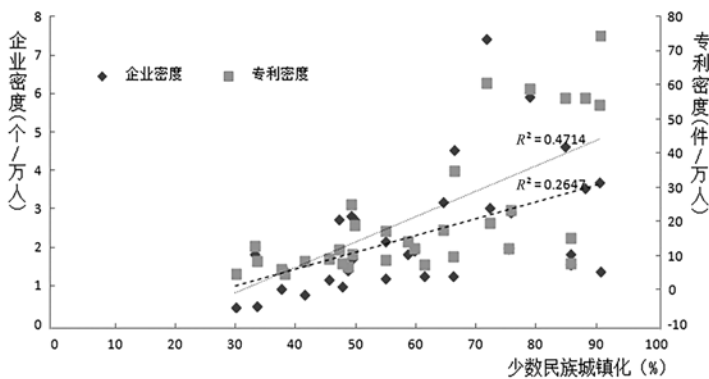


图4 企业密度、专利密度与少数民族城镇化

数据来源:根据《2021 中国统计年鉴》和《2020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计算。

主动作为,极大地提高了经济互嵌式发展的范围和程度。

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提高了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收入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民族八省区城乡差距持续缩小(见表2)。

3.人口受教育程度与经济嵌入

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是人口素质提升的重要标准和人口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是经济互嵌式发展的重要引擎。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指某一特定年龄段人群接受学历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成人学历教育,不包括各种非学历培训)的年限总和的平均数,是测度人力资本总量水平的一

表1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人均GDP (元)	非农产 值(%)	非农就业 占比(%)	人均GDP (元)	非农产 值(%)	非农就业 占比(%)	人均GDP (元)	非农产 值(%)	非农就业 占比(%)	人均GDP (元)	非农产 值(%)	非农就业 占比(%)
全国	1663	73.4	39.9	7942	85.3	50	30808	90.7	63.3	72000	92.3	76.4
内蒙古	1478	64.7	44.25	6502	75	45.6	47347	90.7	51.80	72062	88.4	64.33
广西	1066	60.6	23.46	4652	73.7	37.8	20219	82.5	46.66	44309	84.0	66.15
贵州	810	61.5	21.76	2759	72.7	32.7	13119	86.4	50.37	46267	85.7	66.49
云南	1224	62.8	20.02	4770	77.7	26.2	15752	84.6	40.60	51975	85.3	56.31
西藏	1276	49.1	19.28	4572	69.1	26.2	17319	86.5	46.87	52345	92.1	64.25
青海	1558	74.7	40.02	5138	85.3	39.1	24115	90.0	58.05	50819	88.8	74.55
宁夏	1393	74.0	37.76	5376	82.7	42.2	26860	90.6	60.64	54528	91.3	75.87
新疆	1713	60.2	38.73	7372	78.9	42.3	25034	80.2	48.85	53593	85.7	66.0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表2 2013—2020年全国与民族八省区城乡收入比变化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全国	3.03	2.75	2.73	2.72	2.71	2.69	2.64	2.56
内蒙古	2.97	2.84	2.84	2.84	2.83	2.78	2.67	2.50
广西	3.43	2.84	2.79	2.73	2.69	2.61	2.54	2.42
贵州	3.80	3.38	3.33	3.31	3.28	3.25	3.20	3.10
云南	3.78	3.26	3.20	3.17	3.14	3.11	3.04	2.92
西藏	3.04	2.99	3.09	3.06	2.97	2.95	2.89	2.82
青海	3.15	3.06	3.09	3.09	3.08	3.03	2.94	2.88
宁夏	3.15	2.77	2.76	2.76	2.74	2.72	2.67	2.57
新疆	2.72	2.66	2.79	2.80	2.79	2.74	2.64	2.48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个重要指标。表3报告了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公共教育的发展成效显

著,民族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持续提高,不过与现代产业所要求的学历门槛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实现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后,持续加大高中及以上和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不断缩小教育质量缺口。

人口受教育程度在结构上还可以区分为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本文定义的技能劳动力包括人口中接受过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人口,余下的就是非技能劳动力。由表3可知,1990年以来,无论是全国总人口,还是民族八省区人口,技能人口占比都有很大提升,这得益于各级教育水平的提升。

4.就业结构与经济嵌入

就业嵌入是经济嵌入最直接的重要形式。不

表3 1990年、2000年、2010年及2020年全国及民族八省区受教育程度 单位: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平均受教育年限	技能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	技能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	技能人口	平均受教育年限	技能人口
全国	7.87	2.01	7.65	3.81	8.76	9.53	9.5	16.51
内蒙古	8.13	2.10	7.75	4.08	8.93	10.80	9.74	19.72
广西	7.50	1.33	7.60	2.59	8.40	6.58	9.01	11.85
贵州	7.35	1.47	6.20	2.16	7.41	5.82	8.37	12.07
云南	7.31	1.56	6.43	2.23	7.54	6.21	8.51	12.57
西藏	7.19	1.52	3.61	1.45	5.25	6.11	6.62	12.27
青海	8.11	2.32	6.20	3.59	7.58	9.35	8.47	16.17
宁夏	8.12	2.45	7.12	4.11	8.44	10.12	9.37	18.86
新疆	8.06	2.41	7.74	5.63	8.85	11.60	9.43	17.80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0》《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0》《中国 2010 人口普查资料》和《2020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计算。

同产业和职业的技能要求是不同的,一般而言,非农就业和脑力劳动要求的学历门槛较高,也是经济互嵌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表征。

经济发展在结构变迁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占总从业人口的比重下降,非农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的比重上升。全国和民族八省区的就业结构变迁也符合这一趋势。不过,民族八省区与全国比较,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高,而技术要求高的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偏低。特别是制造业就业,既是就业嵌入式的反映,也对就业人口技能有门槛要求。图5说明,民族八省区制造业就业比例低于全国水平,而且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年以来,广西、贵

州、云南制造业就业比重有上升外,其余省区制造业就业比重在下降。

人口的职业结构是指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各类职业的人口的比例,反映了一个人口群体的经济互嵌式发展水平,同时也反映了劳动者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境遇。在中国的人口普查中,按职业划分的七大类职业中,可以区分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类^①。一般地说,脑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城镇化水平高,主要从事的非农职业,因此经济嵌入程度高。表4列出了根据几次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脑力劳动者占比和职业的多样化指数。其中的职业多样化反映了劳动者在七大类职业的分布散度。可以看出,全国和民族八省区脑力劳动占比在提高,职业多样化程度也在增加。

5.民族构成、城镇化与经济嵌入

一个地区民族构成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嵌入的程度。首先,从少数民族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例看,1990年以来,全国从1990年的8.01%提高到2000年的8.47%、2010年的8.49%、2020年的8.89%。民族八省区中,与2010年比较,2020年少数民族人口占比略有增加的是内蒙古、广西、贵州、青海、宁夏,其余省区略有降低(见表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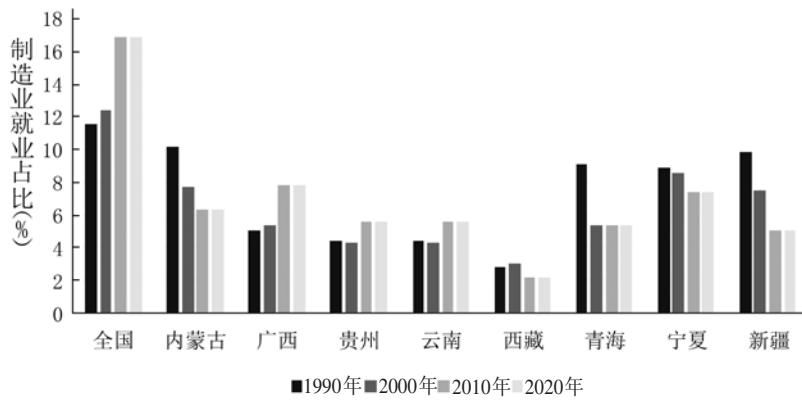


图5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和民族八省区制造业就业占比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0》《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000》《中国 2010 人口普查资料》和《2020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计算。

表4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和民族八省区脑力劳动者占比与职业多样化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脑力劳动者占比(%)	职业多样化	脑力劳动者占比(%)	职业多样化	脑力劳动者占比(%)	职业多样化	脑力劳动者占比(%)	职业多样化
全国	8.81	0.4715	10.47	0.5465	12.93	0.683	19.57	0.7605
内蒙古	12.43	0.5523	13.01	0.5805	14.37	0.6778	23.29	0.7675
广西	6.18	0.3027	7.65	0.3841	8.60	0.5193	15.73	0.7480
贵州	5.68	0.2666	6.63	0.3231	9.07	0.4995	18.70	0.7642
云南	6.26	0.2940	7.01	0.3601	8.31	0.4930	13.44	0.7170
西藏	10.32	0.3633	8.82	0.3419	9.99	0.4247	27.60	0.7828
青海	11.86	0.5032	11.03	0.4600	13.22	0.6109	24.22	0.7669
宁夏	10.76	0.4688	11.45	0.5540	13.81	0.6687	21.02	0.7569
新疆	13.00	0.5444	14.31	0.5875	13.98	0.5891	24.65	0.7669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中国2010人口普查资料》和《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计算。

如果考察一个地区55个少数民族的构成情况,这里利用地区民族构成多样性指数,该指数定义为:

$$EDI=1-\sum_{i=1}^{55}n_i^2$$
 (1)

式(1)中,EDI为地区民族多样性指数, n_i 是第*i*个民族人口占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计算结果表明,2020年全国民族多样性指数为0.9225。民族八省区中,内蒙古为0.2995,广西为0.2918,贵州为0.8215,云南为0.8479,西藏为0.0412,青海为0.6225,宁夏为0.0503,新疆为0.3775。与2010年比较,绝大多数地区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在增加,说明

嵌入程度在提高(见表5)。

各地区民族构成的多样性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和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间关系明显。郑长德(2015)的研究表明,地区民族构成多样性指数与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劳动力占比也与地区民族多样性指数间有正相关性。这些关系实际上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同时也是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经济机会丰裕,对各民族人口的吸引力大;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高、有技能的人口流动和迁移的动力强,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相结

表5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及民族八省区民族构成的变化

	少数民族人口占地区人口比例(%)				地区民族多样性指数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全国	8.01	8.47	8.49	8.89	0.9196	0.9231	0.9233	0.9225
内蒙古	19.42	20.83	20.46	21.26	0.3273	0.3108	0.2910	0.2995
广西	39.24	38.38	37.17	37.52	0.2572	0.2785	0.2779	0.2918
贵州	32.43	37.84	35.70	36.44	0.8142	0.8158	0.8200	0.8215
云南	33.41	33.42	33.39	33.12	0.8448	0.8431	0.8452	0.8479
西藏	96.18	93.94	91.83	87.85	0.0174	0.0247	0.0291	0.0412
青海	42.14	45.97	46.98	49.47	0.6373	0.6341	0.6207	0.6225
宁夏	33.27	34.56	35.15	35.95	0.0303	0.0347	0.0367	0.0503
新疆	62.42	59.43	59.52	57.76	0.4028	0.4020	0.3888	0.3775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中国2010人口普查资料》和《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计算。

合,因此,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少数民族城镇化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和技能水平高的地区,民族构成的多样性高。

经济互嵌式发展的重要表现和主要动力是城镇化。城镇化既是经济社会活动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转化的过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城镇化大体上可以区分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等方面。全国城镇化的发展是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各地区的城镇化又从全国城镇化的发展中获得溢出效应。表6给出了全国与民族八省区人口城镇化。可以看出,1990年以来,全国及民族八省区总人口、汉

族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城镇化速度加快。

表7给出了1990—2000年、2000—2010年、2010—2020年三个时期全国和民族八省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建成区面积)、产业城镇化(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的增长态势。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对一个地区城镇化速度有比较综合的认识。如从全国看,土地城镇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又快于产业城镇化。民族八省区在不同时期,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增长各有特色。

表6 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全国与民族八省区人口城镇化 单位:%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总人口	汉族	少数民族	总人口	汉族	少数民族	总人口	汉族	少数民族	总人口	汉族	少数民族
全国	26.2	27.06	16.36	36.92	38.17	23.36	50.27	51.87	32.84	63.84	65.27	49.19
内蒙古	36.34	37.83	30.15	42.70	44.25	36.80	55.53	57.29	48.70	67.48	69.16	61.23
广西	14.87	18.34	9.49	28.16	32.99	20.41	40.02	45.39	30.94	54.20	57.53	48.67
贵州	19.24	23.87	10.53	23.96	29.14	15.45	33.78	39.29	23.85	53.15	57.51	45.54
云南	14.91	18.70	7.35	23.38	27.79	14.58	34.72	40.79	22.62	50.05	56.25	37.53
西藏	11.52	75.86	9.06	19.43	79.50	15.55	22.67	81.04	17.48	35.73	76.57	30.08
青海	26.17	36.90	11.44	32.33	44.68	17.82	44.72	56.60	31.31	60.08	72.15	47.76
宁夏	26.01	31.69	14.61	32.44	37.88	22.15	47.96	56.23	32.69	64.96	73.72	49.35
新疆	32.50	58.44	16.88	33.84	53.62	20.34	42.79	70.28	24.10	56.53	81.76	38.07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中国2010人口普查资料》和《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计算。

表7 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全国与民族八省区城镇化的增速 单位:%

	1990—2000年			2000—2010年			2010—2020年		
	人口	土地	产业	人口	土地	产业	人口	土地	产业
全国	38.09	70.67	16.21	37.91	78.52	6.33	27.91	51.58	1.76
内蒙古	18.16	4.40	15.77	30.04	75.09	20.88	21.59	21.56	-2.52
广西	86.42	126.23	21.59	42.10	60.51	11.90	35.50	71.99	1.76
贵州	26.09	40.22	18.21	41.65	59.09	18.83	57.20	141.03	-0.77
云南	58.72	96.58	23.75	48.53	122.20	8.97	44.24	68.53	0.79
西藏	50.36	53.31	40.70	19.76	23.06	25.16	57.61	98.35	6.51
青海	50.05	20.76	14.25	41.85	24.10	5.42	36.93	106.50	-1.26
宁夏	26.09	47.41	11.71	47.70	171.20	9.52	35.62	43.78	0.89
新疆	5.99	40.48	31.06	27.17	77.06	1.63	31.43	78.84	6.8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0》《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中国2010人口普查资料》和《2020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计算。

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嵌入发展：问题与限制

前文的分析表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分享了重大的“发展红利”，经济嵌入程度也有大幅度提升，但有效缩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深化经济嵌入发展水平，还面临一系列约束和问题。

1.扩大中的多维发展差距，制约互嵌式发展的范围

从发展结果指标看，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相对差距有所缩小，绝对差距尚在扩大(郑长德，2020)，考虑到发展的综合性和态势，民族地区与全国的发展差距呈现出多维发展差距，而且既有的发展差距尚未消除，又有了新的

发展差距，如数字差距(见表8)。当前，民族地区发展相对滞后，与发达地区发展差距拉大，仍是阻碍各民族经济互嵌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民族省区与其他地区，民族地区内部各地，包括各民族省区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各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程度存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发展不充分。边境地区与内地协同发展不足(郑长德，2022)。

2.多维相对贫困严重，制约着经济互嵌式发展的深度

与“多维欠发达”相联系的“多维相对贫困”。共同走向小康解决的是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主要解决了生存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主要是发展问题和发展成果的共享问题。

民族地区是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和巩固脱贫成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据中国科学院樊杰等(2020)的估计，中国相对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在2亿—3亿人的规模，集中分布在三级阶梯的过渡带、新疆南疆和青藏高原，这里主要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从各省份的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地区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看，甘肃、贵州、云南不仅相对贫困发生率高(>30%)，而且相对贫困人口规模均大于1000万人；青海、西藏、宁夏、新疆等省份的相对贫困发生率也都在30%以上。这些地区的相对贫困，除收入外，还包括许多非货币的维度，如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因此，反贫困从解决生存需求转变为解决发展需求，经济扶贫转到多维扶贫，从数量型扶贫到质量型扶贫，重视发展能力贫困、精神贫困等，破除多维发展陷阱是重点。

3.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差距较大，制约经济互嵌发展的质量

近年来，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取得长足进展，基本公共服务数量共享差距显著缩小，但与发达地区差距较大，与各民族人民的需要相比，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异明显。民族地区交通运输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基本实现从“难”到“通”的转变。但还存在交通体系不完善、线路结构不均衡、运输供给不高效、运输速度还不快、安全性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据调查，民族地区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低主要表现在乡镇村层面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设施和公共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不足主要表现为高速铁路建设和进村入户的道路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中高速铁路、高速

表8 2020年民族八省区的相对发展水平

	人均GDP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化	平均受教育年限	技能劳动力比例	数字经济指数
内蒙古	1.001	0.979	0.979	0.967	1.056	1.025	1.194	0.259
广西	0.615	0.763	0.763	0.865	0.848	0.948	0.718	0.260
贵州	0.643	0.677	0.677	0.680	0.832	0.881	0.731	0.230
云南	0.722	0.724	0.724	0.750	0.783	0.896	0.761	0.257
西藏	0.706	0.747	0.747	0.720	0.940	0.892	0.979	0.275
青海	0.706	0.747	0.747	0.720	0.940	0.892	0.979	0.259
宁夏	0.757	0.799	0.799	0.811	1.017	0.986	1.142	0.233
新疆	0.744	0.741	0.741	0.820	0.885	0.993	1.078	0.254

数据来源：《2021 中国统计年鉴》；数字经济指数来自马克数据网“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指数的测算(2013—2020年)”。

公路已经成为中国各地区发展的重要驱动,数据分析显示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而民族地区处于弱势地位。

在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除个别地理条件特别复杂的边远地区外,数量共享已基本实现,质量方面的差距比交通基础设施质量的差距还大,各省(区)许多有条件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到省城或教育质量好的地区就学,就是典型证明。数据分析显示,各地区普通小学、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的平均就学半径与贫困发生率、文盲率显著正相关,与农民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显著负相关。就医难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省城大医院人满为患。

4.互嵌式发展的空间格局不经济:首位城市独大,空间集聚程度低

经济嵌入发展在空间上要求包容性的空间结构(集中均衡式的空间发展模式)。民族地区主要位于“胡焕庸线”西北地区,距离沿海地区和核心区的空间距离远,地域辽阔,地表起伏大,水土热组合不佳,总体上处于地理不利地区,空间格局不经济成为发展的关键限制因素(郑长德等,2014),突出表现为密度低、距离大、分割严重,区内发展不平衡程度高。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使空间不经济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在全国

总体格局中,西部地区的空间不经济的限制作用仍很突出(见表9)。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八省区经济嵌入发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面临一些约束,进一步深化经济嵌入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加大力度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过程中,应把推动经济互嵌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实现现代化作为着眼点和切入点。

1.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进一步提升经济互嵌水平

总体上,民族八省区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水平排序中,处于后40%之列,而且这种发展差距是多维的,有些方面的发展差距还在扩大。因此,必须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着力实现民族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提升经济互嵌发展水平。为此,应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支持政策体系,从国家战略高度研究部署推动经济互嵌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共同走向实现现代化;政策支持从“单向扶持型”转向“关系促进型”;把促进经济嵌入发展纳入国家规划中。

表9 2020年全国与民族八省区的距离—密度—分割

项目	距离		经济密度 (万元/平方千米)		分割		首位度	
指标	区域临海指数	交通优势度	陆地总面积	建设用地	海拔高差	地表相对平整系数	人口	经济
全国	0.29	—	1058	11562	—	0.5	—	—
内蒙古	0.19	0.49	147	2651	3456.93	0.91	1.17	1.24
广西	0.30	0.46	936	5124	2148.87	0.10	2.07	1.54
贵州	0.16	0.51	1012	6440	2746.64	0.05	1.28	2.90
云南	0.17	0.37	622	5382	6646.54	0.05	2.38	4.06
西藏	0.07	0.03	16	152	8773.56	0.36	3.75	4.58
青海	0.06	0.36	42	500	5196.36	0.63	3.53	6.27
宁夏	0.11	0.43	590	3478	2459.91	0.68	2.99	3.24
新疆	0.00	0.14	83	924	8742.93	0.59	5.87	3.73

数据来源:距离指数来自《中国地理国情蓝皮书》(2020版)(刘纪平主编);分割指数来自《中国地理国情蓝皮书》(2017版)(程鹏飞主编);经济密度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首位度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1)计算。

注:区域临海指数值越大,表示临海程度越好;交通优势度越大,表示综合交通水平越高;陆地总面积密度=地区生产总值/陆地面积,建设用地密度=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建设用地面积;海拔高差=区域海拔最高点与区域海拔最低点,地表相对平整系数越大,说明地表越平坦。人口首位度=区域城市中城镇常住人口最多的城市/区域城市中城镇常住人口第二多城市(西藏是市辖区人口,新疆是全市人口),经济首位度=区域城市中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最大的城市/市辖区地区生产总值第二大的城市。

2.持续支持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各种成本

基础设施持续提升依然是民族地区互嵌式发展和共同走向现代化的主要着力点。基于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差距,中央政府和对口支援相关各方拟继续加强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着力于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普惠性。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提升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一体化水平,着力于提质量,增速度,进一步降低阻碍发展的各种交易成本;通过乡村村组道路网络化,实现区内的一体化。同时进一步加快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各类基础设施质量、效率的提升。

3.持续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

各民族共享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是经济互嵌式发展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数量供给已有根本改进,但在供给质量方面差距还较大。因此,必须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持续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着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郑长德等,2021)。将教育发展目标从重教育数量转向教育数量和质量并重;多渠道完善师资队伍数量和结构;持续加强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同时进行公共卫生普查,摸清各项数据,有力、有效预防,以提高改善各族人民健康水平。

4.深度对接和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在协调发展中推进经济互嵌式发展

解决好区域间及区域内发展不协调问题,使民族地区深度融入全国区域经济网络,为各民族在经济上互嵌融合发展提供有利的空间条件。区域协调发展是推动民族地区互嵌式发展、共同现代化的战略支撑。根据民族地区的区位、禀赋结构和发展阶段,民族地区区域协调发展一方面要积极对接和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按照集中均衡开发模式,引导人口和经济活动向重点开发区域及区域性中心城镇集聚,而基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实现空间上的均等化。依托重点交通轴线,以城市群为核心发展经济支撑带(区),促进人口集聚,在集聚中实现互嵌。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引领,主动融入国家级经济带建设,同时根据民族地区的发展阶段和禀赋结构的变化,着力构建新的经

济支撑带。以城市群为核心促进经济集聚,发展北部湾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黔中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建设国家门户城市、国际旅游城市。

5.利用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升产业的嵌入性和融合发展水平

通过产业互嵌融合,形成产业共同体,从而推动民族地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升级产业结构,促进经济互嵌。目前现代产业链向民族地区延伸不够,民族地区现代产业发展水平低,特别是过早去制造业化(郑长德,2014)。推动民族地区经济互嵌式发展,必须促进民族地区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根据民族地区的地理禀赋与在全国主体功能区中的地位和世界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支持旅游业、民族文化产业、生态康养产业的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资源型产业的升级,用数字经济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包括民族特许品)的生产以及让这种新的数字技术来加强营销和创造新的业态,让传统产业能够在新工业革命时代焕发新生。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产业发展上,考虑到民族地区的生态功能,一是对到民族地区投资的企业实施投资补贴,二是把对口支援和产业转移相结合,在援助地区建立受援地飞地工业园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优化发展格局,为实现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共同走向现代化和互嵌融合发展提供新动能。

6.互嵌导向型的对口支援与合作政策,着力提高民族地区互嵌发展的内生潜力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习近平,2022)。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政策举措,营造环境氛围,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里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习近平,2022)。在转移支付方面,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除收入性转移支付外,宜强化对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生态保护和区域创新方面的倾斜,提高发展型转移支付的比重。在发展援助方面,过去强调供给侧支援(援助),着力于禀赋结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资等);今后在强调供给侧对口支援的同时,宜把需求侧的支援(援助)放在重要地位,着力扩大民族地区的市场范围[消费援助(消费扶贫)、商业模式推广等]。在援助地区建立受援地工业园

(飞地经济)是把供给侧与需求侧结合起来的对口支援的理想方式。

注释

①脑力劳动者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体力劳动者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参考文献

- [1]ALESINA A, E L FERRARA.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43(3).
- [2]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 [3]马克·格兰诺维特,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M].瞿铁鹏,姜志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4]马克·格兰诺维特.社会与经济:信任、权力与制度[M].王水雄,罗家德,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 [5]菲利普·阿吉翁,史蒂夫·杜尔劳夫.增长经济学手册[M].

- 冯科,胡怀国,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
- [6]《人间奇迹》编写组.人间奇迹:中国脱贫攻坚统计监测报告[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 [7]刘纪平.中国地理国情蓝皮书(2020版)[M].北京:测绘出版社,2022.
- [8]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5年.
- [9]郑长德.新发展理念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21.
- [10]郑长德.外联与内聚:内地与沿边协调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22.
- [11]郑长德.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 促进各民族同步现代化[J].民族学刊,2023(2).
- [12]郑长德.空间经济学与中国区域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
- [13]郑长德,等.走向共同繁荣:新形势下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 [14]程鹏飞.中国地理国情蓝皮书(2017版)[M].北京:测绘出版社,2018.
- [15]樊杰,周侃,伍健雄.中国相对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问题典型研究与政策前瞻[J].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7).

Research on Promoting the Interembedd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Ethnic Regions

Zheng Changde

Abstract: Promoting mutually embedd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i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ntry point for promot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and regions.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embedded development is a mutual influence and penetration relationship formed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rough market and non market economic transactions, and the role of economic embedded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apital accumulation,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ight ethnic provinces and region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verty alleviation, urbanization, education level, employment structure, spatial distribution, etc., and the degre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each reg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ut the degree and level of interdependence are also constrained by some factors. Therefore,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it is necessary to “support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ethnic regions”,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continue to suppor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urther reduce various cost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mong ethnic group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focus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upply, and deeply integrate and integrate into the natio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mot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utilizing changes in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s, enhancing the embeddedness and level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implementing targeted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policies, and focusing on enhancing the endogenous potential of embedded development in ethnic regions.

Key Words: Ethnic Regions; Economic Interlocking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张 子)